

贾谊传注

上海人民出版社

K827/7

贾 谊 传 注

本 社 编

2011/7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贾 谊 传 注

本 社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日历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75 字数 55,000

1975年11月第1版 1975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71·147 定价: 0.25元

目 录

评贾谊对秦汉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	红 宣 (1)
贾谊传(节选自《汉书》)……	上海市冶金局工会注 (17) 上海师大历史系
贾谊作品选注	上海市冶金局工会 (32)
过秦论(节选).....	(32)
治安策(节选).....	(59)

评贾谊对秦汉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

红 宣

历史上许多法家代表人物，都很重视总结历史和现实的斗争经验，总是不断地从分析前人和他们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中，寻找当前斗争的借鉴。西汉初期的法家思想家贾谊，就曾经对秦和西汉建国以来这一段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经验进行了多次的反复的总结。尽管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在贾谊思想中包含有一些消极成分，但那是支流；从主流上说，贾谊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丰富和发展了当时的法家思想，从而为西汉政权沿着正确的法家路线前进提供了理论上的保证。

(一)

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取得政权之后，面临着的头等大事就是怎样巩固和加强本阶级的专

政。为了这个目的，总结秦王朝兴亡的历史经验，是汉初政治家和思想家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秦王朝作为地主阶级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派别，必然以不同的态度和观点去评论它的兴亡。司马迁说：“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这里的“学者”，就是那帮儒生，他们的复辟倒退的立场，决定了他们不但不能懂得这段历史的价值，而且必然要对秦始皇的统一事业进行各种非难和指责。意识到在这段历史中存在着十分宝贵的经验的，则是新兴地主阶级。汉高祖刘邦登位不久，就要别人“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表明他们懂得从研究秦的兴亡入手可以研究汉怎样才能长兴不衰，懂得可以从秦朝历史经验中探求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道路。时间没有过了多久，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政治家的贾谊，严肃而认真地探讨了刘邦提出的“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这个重大课题，他的早年著作《过秦论》，就是一篇系统论述秦朝兴亡历史经验的典型作品。他在《过秦论》结尾中说：“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尽管贾谊的视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唯心

史观的蒙蔽，尽管他仍然会得出一些错误的甚至可笑的结论，但是他为了地主阶级治理国家的现实斗争的需要来总结历史经验，目的是明确的，态度也是严肃的。

贾谊在总结秦朝历史经验中，首先对秦统一中国的成功经验，进行了热情的讴歌。他指出，秦的统一，“天下之士，斐然乡风”，“既元元之民”也“莫不虚心而仰上”，从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直到老百姓，都是拥护的。为什么呢？“其势居然也”。因为“近古之无王者久矣”，“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人民饱尝了分裂的痛苦，统一是普遍的愿望。那么统一事业为什么会由秦来完成呢？贾谊正确地指出，早在秦孝公时代，“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秦始皇继承和发展了秦孝公和商鞅的事业，“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才能“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这就对商鞅以来的法家路线和耕战政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贾谊的这些论述，完全是出于地主阶级现实斗争的需要，具有极大的针对性和鲜明性。因为当时的那股反秦思潮的中心内容正是对秦始皇统一事业的攻击和非笑。什么“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呀，什么“秦

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呀，什么“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呀，……很明显，这种“统一导致秦亡”论，讲的是历史，着眼点却在现实。秦始皇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也就是刘邦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否定秦的统一，也就是否定汉的统一。贾谊正是通过总结秦统一中国的成功经验，回击了那股嚣张的倒退思潮，论证了地主阶级统一事业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反映了地主阶级对于新兴的统一的西汉王朝充满了信心 and 希望。

如果说，地主阶级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当时已经有了秦始皇和刘邦两次成功的经验；那么地主阶级巩固政权的斗争，秦王朝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尤其是怎么总结秦二世而亡的教训的问题，对于刚刚重建本阶级专政的地主阶级来说，就显得特别重要和迫切。贾谊把《过秦论》作为自己经验总结的题目，就表明他是把重点放在这上面的。但是，青年时期的贾谊却没有能够从这教训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他正确地肯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所采用的革命暴力，但又错误地否定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等镇压奴隶主势力所采取的革命暴力，并且把它与秦二世时期奴隶主势力对地主阶级反攻倒算的反

革命暴力良莠不辨地混为一谈。他看到了地主阶级在夺取全国政权前后地位的变化，但却把这种变化概括为“攻守之势异也”，看不到地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还必须同被推翻的奴隶主阶级进行反复斗争，因而就把夺取政权的路线同巩固政权的路线对立了起来。他认为秦亡的原因是“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仁义不施”，从而提出了易道改政，以“仁义”来代替“法治”的主张。虽然他猛烈抨击秦二世的“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也多少还是看到了赵高这一类“不轨之臣”对于地主阶级政权的危害；但是，他看不到这正是奴隶主阶级的反革命复辟，反而提出“仁义”之类的说教，表明了青年时期的贾谊受儒家思想影响之深，反映了他没有从根本上同那股反秦思潮划清界限。就这点而言，他的《过秦论》是论错了。他对秦亡原因下的总的结论同他对秦统一事业的赞美，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

贾谊这种理论上的矛盾，是受到地主阶级当时现实斗争需要的影响和制约的。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之间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是高一阵、低一阵的。汉初，经过秦末农民大起义、楚汉战争和打击异姓诸侯王的一系列的斗争，奴隶主复辟势力受到了沉重

的打击；尽管这个阶级还在，还要作垂死的挣扎，但需要有一个积聚力量的过程。因而在汉初的二三十年里，出现了“载以清静，民以宁一”的相对稳定局面。地主阶级在夺取政权后为巩固政权而作的斗争中总是带有很大的被动性，他们不可能透过相对稳定的现象看到潜伏着的矛盾发展的本质，不可能在取得一次胜利后主动地自觉地给自己提出夺取更大胜利的新任务。从刘邦和他的臣僚直至贾谊，大都把夺取政权看成是“攻”，把巩固政权看成是“守”，就反映了这个阶级在夺取政权前后革命性和保守性这两个侧面的消长。用这种眼光来总结秦亡的教训，自然不可能看到赵高复辟中断了秦始皇法家路线是秦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不可能看到坚持法家路线、不断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对于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根本意义。随着中央政权与同姓诸侯王割据势力的矛盾、实质上是地主阶级同奴隶主复辟倒退势力矛盾的日益激化，按照地主阶级打击割据势力和奴隶主残余势力的现实需要，晁错和稍后的桑弘羊等人才比较细致地分析了从秦始皇到秦二世时期路线政策上所发生的变化，鲜明地提出了赵高篡权的危害，得出了比较接近于客观实际的结论。地主阶级总结秦亡教训所经历的曲折过程，反映了他们探求巩固政

权的道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只是在不断地反复地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中，它才能慢慢地变得成熟起来。

(二)

但是，当时的地主阶级毕竟还处于上升时期，它的阶级利益同历史进程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还比较地敢于面对现实，能够从反复实践中总结出相对正确的结论来。贾谊生活于封建中央政权和诸侯王割据势力的矛盾从缓和到激化、从隐蔽到公开这一转折关头，他在《治安策》中，总结了汉初阶级斗争的经验，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自己早年认识上的错误，充实和发展了法家思想。

地主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是否还需要进行反复的斗争？这个阶级的思想准备是很不足的。光着眼于“守”行不行？树欲静而风不止。贾谊亲眼看到，在平定了异姓王叛乱以后，“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燃。”先是“亲弟谋为东帝”，淮南王刘长企图夺取帝位；接着是“亲兄之子西乡而击”，济北王刘兴居又起来造反；“今吴又见告矣”，现在又有人来告发吴王刘濞正在准备叛乱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给予贾谊以深刻的教育，使他敏锐地看到诸

侯王问题的严重性，若不赶快采取措施，西汉王朝随时都有被分裂颠覆的危险。他针对那些儒家的信徒们鼓吹“天下已安已治”的谰言，尖锐指出，当今之势，正如“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再三提醒汉文帝决不能“以危为安”，“以乱为治”。他运用黄老之学的朴素辩证法，指出“日中必昃（音位），操刀必割”，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消极防守是不行的，必须“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抓紧有利时机，打主动仗。

贾谊的成就不仅在于看到了诸侯王反叛的现象，而且还通过对多次重复出现的诸侯王反叛现象的总结，对于本阶级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新估价。刘邦部分地采用分封制，有其不得已的一面，他看到了这样干会有不良后果，但由于年轻的郡县制还不很巩固，还是不得不然。当时舆论则认为这是“矫秦之枉”。贾谊在《过秦论》中也曾经主张过“裂地分民”，现在轮到他来“正先帝之过”了。贾谊总结了分封异姓王的教训，“十年之间，反者九起”，致使“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那么分封同姓王是不是好一些呢？也不行，“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不管是异姓王也好，同姓王也好，只要时机一旦成熟，他们就会

起来反叛。“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强者先反”，这就是贾谊的结论。诸侯王的叛乱，实际上是反映了地主阶级与奴隶主残余势力、封建制与奴隶制之间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些向中央闹分裂、搞割据的诸侯王，是奴隶主残余势力在封建政权内部的代理人。他们搜罗了一帮子反动儒生和工商奴隶主，扩大势力，推行复辟路线，最后势必起来叛乱，以武力威胁中央朝廷，要求全面改变政权的性质。贾谊虽然没有能够也不可能从这种阶级关系的本质上去揭示这个必然性，但是他毕竟从现实中最终认识到，分封制是行不通的，只能造成“一胫之大几如要，一肢之大几如股”，“尾大不掉，末大必折”的局面。巩固政权的道路只能是实行中央集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他将秦汉不同情况作了对比，指出秦始皇“日夜深虑，苦心竭力，以除六国之忧”，而今天的分封制，实际上是“故成六国之祸”，是历史的倒退，绝对不能那样办。这就对秦的历史经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过去“裂土分民”的主张作了自我否定。从地主阶级巩固政权的反复斗争中总结出的这一经验，成了贾谊法家思想最有光辉的部分。

对付这些蓄谋反叛的诸侯王采取什么办法呢？青年时期的贾谊曾经信仰过“仁义”，能不能对他们讲“仁义”呢？贾谊从“强者先反”的规律中进一步得出结论：决不能搞“仁义”。“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那些诸侯王，都是大骨头，用“仁义”这种薄片刀，“不缺则折”，只能采取大斧头，即实行法治，予以坚决打击。当然，贾谊没有意识到“仁义”与“法治”是两条路线的对立，反映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清除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既然解决诸侯王问题是当时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中心课题，是坚持前进、反对复辟，坚持统一、反对分裂斗争的中心内容，贾谊也就实际上在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否定了儒家路线，坚持了法家路线。

汉初中央政权同诸侯王的矛盾和斗争有一个逐步激化和发展的过程。正是在总结这一经验的基础上，贾谊第一次向统治者提出了“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接着，晁错又更尖锐地指出那些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断然采取了“削藩”措施。当西汉朝廷运用“法治”大斧，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坚决打击工商奴隶主势力之后，桑弘羊又总结了诸侯王和工商奴隶主势力的内在联

系，客观上向人们揭示了这一斗争的阶级实质。从贾谊、晁错到桑弘羊，法家路线坚持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西汉地主阶级在反复辟、反分裂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和积累统治经验的过程。

贾谊及其后继者的认识过程告诉我们，一条正确的路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而是先进阶级在反复实践、反复总结中产生和发展的。对于正确路线的理解和认识，也不是生来就有的，需要通过反复实践、反复总结才能逐步加深、逐步提高贯彻和执行正确路线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毛主席指出：“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认真总结经验对于坚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总结经验既然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就不能不受到他们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影响。贾谊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所生活的时代是西汉地主阶级巩固政权、防止奴隶主复辟的时代，整个社会都刚刚经受了一次农民大起义的战斗洗礼，这就决定了他对秦

汉之际历史经验的总结，必然深深地打上他那个阶级的烙印，鲜明地染上了那个时代的色彩。

秦末农民大起义，犹如火山爆发一般地显示了农民群众的无比威力。贾谊以半是赞叹半是惊愕的心情反复评论着这次起义。他一方面正确地指出推翻秦二世政权的，正是那些“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普普通通的农民和奴隶，他们“奋臂于大泽”，“天下云集响应”。另一方面，他又本能地感到了农民这股力量的可怕，时刻担心那种“一夫作难而七庙堕”的局面在汉初重演。他在一系列总结经验的文章中，翻来复去地教训统治者的，就是要看到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力量。他认为“民者多力”，“不可不畏也”，“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他一再告诫统治者不可轻视“民”的力量；轻视了，就有国破身亡的危险。他认为统治者“愚”、“智”的界限，就在于“苦民”，还是“敬民”，“苦民者是谓愚，敬士民者是谓智”。当然贾谊反对“苦民”，决不是站在广大受剥削的劳动人民立场上讲话，恰恰是站在农民的对立面说的，“敬民”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驾驭农民，统治农民。他曾把国君比作殿堂，大臣比作台阶，而农民则被视为低地，认为“堂”要建在“地”上，而且有了“台阶”才能显出“堂”高。这就清

楚地表明，广大农民对于贾谊来说，不过是建筑封建大厦的一种基础，他讲的“敬民”，不过是维护地主剥削压迫农民而不使其造反的封建秩序的手段。

从现实生活中，贾谊看到了工商奴隶主势力的膨胀，将会造成农民与地主矛盾激化的严重恶果，破坏了封建生产关系，“盗贼直须时耳”，农民造反就迫在眉睫了，所以主张对奴隶主残余势力给予坚决的打击。他猛烈抨击了工商奴隶主奢侈豪华的生活，尖锐地指出：“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尽管贾谊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从防止农民造反出发，来看待打击工商奴隶主、保护封建生产关系的重要性的，但在封建生产关系还是基本上适合于生产力的条件下，客观上对农民还是有利的。“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说的是秦始皇还不太懂得奴隶主势力的膨胀会激化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因而打击奴隶主还不很自觉，对某些工商奴隶主如巴寡妇清甚至十分优待。经过一次农民大起义，贾谊就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奴隶主势力的复辟活动是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贾谊的这一思想进一步为晁错、桑弘羊所继承和发展，终于在汉武帝时期发动了一场对工商奴隶主的全面反击，封建制度